

烈火春秋

• 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

鹭江出版社

烈火春秋

· 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

中共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
莆田市老区办
莆田市民政局

李祖兴 主编

鹭江出版社

1992年·厦门

[闽]新登字08号

烈火春秋

——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

中共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

莆田市老区办

莆田市民政局

李祖兴 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4插页 207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80533-553-2

K·29 定价：5.00元

编者的话

根据闽中老同志的意愿，为保存革命史料，弘扬革命精神，我们选编了这本书。

本书所收回回忆录均为闽中老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斗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篇目根据各人所回忆的内容，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

鉴于闽中三年游击战争方面的回忆录已被收入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中游击区册》中，故本书对这方面的文章原则上不再收编。

对健在的老同志的回忆录，我们在编辑工作完成后，一般都呈请作者本人审阅定稿。

对已经去世的老同志的回忆录，我们尽量使之保持原貌，只对其中有出入的个别史实用加注的方法予以说明。有些回忆录标题及一些文字作了必要的改动。

1991年6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我在莆仙地区建党初期的活动	陈国柱(1)
莆田早期革命斗争回忆	吴梦泽(9)
邓子恢在外坑苏区	张兆汉(16)
烈火春秋	程序(22)
赴延安之前的革命活动	黄明(35)
两次香港之行及“泉州事变”始末	黄国璋(44)
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前后	杨采衡(56)
风雨如磐十二春	
——1938年～1949年泉州中心县委革命斗争概况回忆	许集美(65)
惠安党组织的沿革(节选)	朱汉膺(122)
在抗日反顽的艰苦岁月里	饶云山(127)
战斗在长乐	刘润世(138)
忆闽中抗日反顽武装斗争	黄国璋(161)
曙光就在前头	
——忆40年代惠安的革命斗争	张海天(180)
省委机关南迁闽中纪实	祝增华(191)
福建省委在德仙永边区	苏华(196)
“截钞”纪事	康金树(201)

浴血奋战迎解放	林汝楠(207)
泉州劫狱	颜嘉祥(214)
为冲出牢笼而斗争	霍劲波(227)
德仙永边区的游击斗争	毛 票(240)
福州工委斗争琐记	蔡光周(249)
建立大洋革命根据地	饶云山(254)
黎明前的战斗	林汝樑(265)
后记	(274)

我在莆仙地区建党初期的活动^①

陈国柱

一、“五·四”运动后至北伐军入闽前的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时期，我在哲理中学念书。当时莆田有学生会（这学生会掌握在豪绅地主子弟的手里）。我们参加了“反日”、“抵货”运动。记得我们哲理中学的同学和我哥哥^②曾到涵江去搜奸商的布匹。当时习演“文明剧”作反日救国宣传，都是由学生组织的。为了反对“二十一条条约”，我们组织学生军，每天早上做体操，并且唱《国耻歌》：“五月九日，呜呼国耻！”莆田各中学都有这样的行动，有时也派人到农村讲演救国道理。

记得是1922年，我亲自在常太区组织区学生会，进行反对北洋军阀勒索盐捐的斗争。由于收税人员压迫太厉害，所以全常太的农民都起来反对，我们站在最前面，直接向当地驻军交涉，要求取消捐税。他们慑于民众的力量，不得不取消，我们取得了胜利。因此，常太的学生会为全区民众所拥护，于是我们开办了一所小学。

“五·四”后，我曾在学校里看到数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但这种新刊物，莆田的青年看得不多。我进厦门大学以后（1921年），我的同学施乃

①此文系陈国柱根据中共晋江地委党史办1962年开列的调查提纲所作的书面答复中的一部分。本次选编时对文字略作删节。

②即陈国桢，中共党员，长期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工作，1949年夏在龙岩被国民党杀害，系革命烈士。

铸^①，曾送给我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30多本，我带回家，交给朋友们看。同时林嵩龄^②曾从上海带回马列主义书刊多种，也交给了莆田朋友。

这时期在外边求学的莆仙籍青年学生并不很多，在北京各大学的只数个，在上海各学校的也只有数个，在厦大有10多个。当时因为国立大学比较难考，进私立的经济又花费太多，所以多数人到沪、厦两地求学。1924年，厦大闹风潮，学生大多数跑到上海大夏大学，留在厦大的不多。所以泉属、兴属的学生，在大夏大学比较多，在上海大学也有好几个。

上海大学是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办的，是当时党中央所领导的，其中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中心。其次有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莆仙留沪的同学有很多人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上大的同学。当然接受与否，则看各人的思想状况，但真正参加组织的并不多。莆、仙、泉籍的学生，在上大的有陈伯达、林嵩龄、陈嘉谟（即陈啸高）、张剑；在大夏的有我、吴世华、杨世宇、杨帮颜、周清水等；在交通大学的有黄苍麟等。大夏团支部初成立时，闽籍学生有我、陈兴钟、杨帮颜、蔡珊等4人。黄苍麟^③在交大参加团。上大的林嵩龄、陈嘉谟^④等也参加

①施乃铸，中共党员，系陈国柱的入党介绍人。

②林嵩龄，莆田人，上海大学学生，1925年在该校加入中共组织，1926年秋毕业回莆田，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1927年12月任莆田县委员。1929年以后逐渐脱离组织。

③黄苍麟，莆田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1925年在该校加入中共组织，1926年秋毕业回莆田，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主张教育救国，逐渐脱离组织，以后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

④陈嘉谟，仙游人，上海大学学生，1925年在该校加入中共组织，1926年夏奉命回仙游开展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参加闽中党组织领导的仙游游击队。解放后在省文化部门工作。

了团。在复大的有方泗英（方尔灏）、陈昭礼（都是福州人）。“五·卅”运动后（1925年冬天），大夏的当局反动，有许多闽籍学生跑到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参加了党和团组织。

我毕业于1925年底，随即转回莆田。陈兴钟和方泗英已先我一年回福州，开始建团工作。黄苍麟、林嵩龄尚未毕业，陈嘉谟也未毕业，杨帮颜、吴世华等都在广州。所以1926年北伐军入闽前，我即开始在莆田进行建党工作；陈兴钟、方泗英也在福州进行建党工作。北伐军入闽以后，广州那一批学生回到厦门、闽南一带，也投入建党工作。

二、在莆仙建党、建团

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当时团的负责人，要我以全国学生总会的名义，回家去宣传。我带上了很多印刷品，想找莆田学生会，但没有找到，便在山里一带分发。不久，我即回沪。1925年底我在大夏毕业，是年赶回家，哲理中学副校长刘丽川聘我任哲理中学教员。先前，我从上海即将回莆的时候向党中央报告，记的是袁孟冰同我接头，决定让我回莆进行建立地下党的工作，直接和中央（上海）发生联系。正月初开课，我所教的是高中的国文、社会学。这期间，第三年级的陈天章、王纪修等，第二年级的陈兆芳，一年级的陈德来、吴梦泽等学生与我接触较多。我每天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即得到他们的拥护。于是我即把陈天章、吴梦泽、陈兆芳、陈德来等学生调来开会，让他们参加组织，当时是以团的名义。以后又发展王纪修、吴郅治（德化人）、翁祖武等学生，是为当时核心组织。这就是莆田党团混合支部的开始。这时，黄苍麟、林嵩龄（即岳山）还没有回来。大概过了有一个月，一年级有一个叫林汝潘的

学生（牧师的儿子），因为分数太低，向我捣乱，一伙牧师的子弟准备罢课。有一天，他们果然罢课。他们罢课，我也就罢教。同时，我一面写信给广州的杨帮颜、任旭等，请他们替我找工作。后得到他们的来信，说广东正需要党员同志，叫我立即去，于是我就辞了哲中的教职。我离家经过厦门时，正值3月18日北京惨案发生，在鼓浪屿还看到号外。乘船到广州港外又值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在海上停了两天才上岸。上岸后，我住进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同学的宿舍里，找到了组织关系，即由广州特区党委决定，派我到刘少奇领导下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大会结束后，广东党组织派我和林伯渠接洽，到第六军第三团第三营作政治宣传员，于是我便到惠州横沥镇营部训练军队。广州准备北伐时，组织上又调我回福建工作，准备迎接北伐军。于是我转道去上海转组织关系。在上海时，和我谈话的是罗亦农，他要我回福州找陈兴钟。我到福州后，住在南台旅社内，被北洋军密探前后监视。我把介绍信放在草帽里边，才找到组织转了关系（大约是1926年5~6月间）。组织决定我回莆田工作，继续以教员为掩护。于是，我又由刘丽川复聘为哲理中学教员，并兼省立四师、公学中学、涵江中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在哲理中学，我将原有的党团组织扩大起来，并在涵中开展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在这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派陈天章、陈兆芳、吴梦泽等回农村，组织支部，于是党的支部发展到农村中去。这是北伐军未到莆田前的情况。

1926年秋季开学时，北伐军已进入福建。此时，我们以国民党县筹委会名义，大发传单。北伐军入莆时，所开的祝捷大会，完全由我们主持，并发动各区农民参加，其中常太、广业、笏石、黄石和郊区农民进城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震动了各处。据说，当时的祝捷大会，发动这么多民众参加，在全省以莆田为

第一。这是我们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结果。也因此我的名声大噪，极为国民党右派何子扬等人所忌。这也是“清党”时我被追捕的原因之一，这时黄苍麟才回来，在涵中当教务长。林嵩龄也回来了，在公学中学当教员。他们和我发生党的关系。

当时莆田各地都有党支部。记得除丰尾以外，广业、渔湖溪（夹漈村）有一个支部，澳柄村有一个支部，常太山门有一个支部，郊下有一个支部，还有其他的我忘记了，有的是党团混合支部，有的是党支部，有的是团支部。因为大革命初期党团支部的干部没有那么多，又都是新建立的，党团组织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大概农民多的是属于党的支部，学生多的是属于团的支部。1938年中央在延安作出决议，凡是1928年以前的团员皆承认为党员，就是一个例子。

莆田特区委的领导者，当时是我和黄苍麟、林嵩龄、陈天章、陈德来，没有具体分工，总负责是我。各地支部，我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是秘密的组织，我们没有统计，但各负责人自己都知道。比方广业是吴梦泽管的，涵江是黄苍麟管的，郊区是林嵩龄管的。

我到福州是福州光复后不久，方尔灏、陈兴钟写信要我去的。到省后，首先由方尔灏找我个别谈话，他向我询问莆田的情况，仙游的陈嘉谟也在座。记得我到方尔灏家里去时，适值方的母亲做寿。这一回见面以后（1926年底或1927年初），约有二三天，我们就到党委机关里开会。记得有潘作民（建瓯）、陈嘉谟和我以及陌生的二三人。在机关里，陈兴钟是组织部长，陈昭礼是宣传部长，林淑玉（蔡珊的妻子）是妇女部长，还有陈芝英（陈兴钟的妻子）等人。开会的时间不长，说一些如何发展组织，做好国民党工作，深入下层开展运动，等等。

当天晚上，我又到东路军政治部去。政治部主任是江董琴，

永定人。在那里遇到尚友、蔡珊、帮颜等熟人。我们聊些不紧要的事。他们催促我回莆，于是第二天我就从小路回到莆田。那是担心右派对我暗害，没有走大路，而由永泰转莆田大洋回到广业广官，住在夹漈附近一个小镇里，翌日清晨，才回到莆城。当时除党内同志外，没有人知道。

莆田CY的组织，是在建立党组织的同一时候，即1926年农历正月间建立的。党团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记得陈德来、翁祖武等负的主要责任，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学生方面。党员负责农民支部和领导国民党各区分部，团员等做学生青年的工作。

关于仙游党建团的情况。仙游的陈嘉漠当时在上海大学念书，入了团，同我有联系。在参加福州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时，他是仙游的负责人，但没有什么实际工作，以后又派回仙游，此后他的工作情况我不知道。在北京读书的有黄经芳^①，别号纬庭，即黄震，是北京师大的党员，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随军到东江，失败后到莆田。我走以后，他是莆田党组织的负责人，对莆仙党的工作，有一些贡献。比方王静属^②同志就是他介绍给我的。

1927年下半年，我在漳州闽南临委工作，农历九月初三我母亲逝世，告假回家奔丧，省委要我事后就留在莆仙进行整顿并扩建党组织的工作。我于九月初六从江口上船，秘密回家，

①黄经芳，仙游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奉派回莆仙地区开展工作，同年12月任莆田县委副书记。次年3月，因与福建省委领导人意见不合，遂脱离党组织，此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解放后任福建农学院教授。

②即王于洁，仙游人，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1927年11月加入中共组织，先后任仙游县组织部长、闽中特委书记、福建临时省委常委等职。1937年2月因叛徒出卖在莆田被捕，同年6月在福州英勇就义。

即害大病。这时莆田党组织由宋耀华^①、陈天章、吴梦泽等负责。在奔丧期间，我因不敢到城里，便和他们在家里秘密讨论布置工作。因为我在莆田不能安身，遂由黄经芳、宋耀华等决定让我去仙游，在仙游县中学以教书为职业，继续进行建党工作。

到仙游后，我住在县中附近金石山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在这期间，我到处了解情况。我到东乡榜头王静圃家里，看他家里生活困难，又决心革命，于是我就介绍他入党，由他在那里发展组织。结果他找到陈博等16人，多数是农民，成立秘密组织，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另外在城外西门兜，我又找到我的学生许淑修，介绍他入党。以后，由他发展当地的陈××（名字忘了）和南门外乡下一个姓郑的入党，共3人成立一个党支部。在此之前，1927年4月间，我在兴太山区上官避难时，找到了林锦堂、林步庭等8人，成立一个党支部^②，这时仙游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年底，成立了仙游县委，由我自任书记，王静圃任组织部长，许淑修任宣传部长，林步庭为县委委员。

1928年春，某中学校长黄良骏（是我上海大夏大学的同学）答应我在某中学当国文、历史教员；不久，我又当某女中的教员。我除教书外，积极活动，时常到东乡、南方（莆仙到枫亭中间的一个大镇）去，在南方也建立一个党支部，只有3个人，名字忘了。在学校里，我找到几个对象，但不敢公开召集，因为当时反鸦片捐运动太紧张，林寿国^③系统派人对我暗中监视。以后，我就不敢到外边走了。当时的工作计划是依现有的关系，发

①宋耀华，莆田人，中共党员，1927年8月接替陈国柱（赴党中央请示工作返闽后被留在省委机关工作）任莆田特区委书记。同年12月莆田县委成立时，任县委副书记，直至1928年12月。以后情况不详。

②这是仙游境内第一个中共组织，称中共上官支部。

③驻莆仙一带的军阀。

展地下组织，以反对鸦片捐为主发动农民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

一直到1928年5月初，我要求到莆田一次。我回到莆田，林寿国就秘密控告到省政府，要密缉我。在莆田约三四天。有一天我正在坂尾林嵩龄家讨论莆田的工作，忽然省政府密缉的公文到莆田。县府收发公文的某吏回家告诉他兄弟，他兄弟即到宋耀华那里通知，于是莆田县委立即派同志在东西南北城门等我，阻挡我入城；又通知林嵩龄处告诉我，于是我就隐藏在坂尾林家数天，旋又到广业等处布置工作。经莆田县委讨论（当时我们在延寿桥头开会，到会者有黄经芳、宋耀华、吴梦泽等数人），决定我去厦门向临时省委报告，另外分配工作。以后，莆田工作由黄经芳、宋耀华、黄苍麟、吴梦泽、王纪修等负责，仙游暂由王静圃负责。我还向他们交待了上宫、南潭等处的关系。工作安排后，我由笏石店头坐木船到晋江转厦，时为1928年夏天。从此，我就永离莆仙了。

（1962年12月1日）

莆田早期革命斗争回忆

吴梦泽

一、莆田哲理中学党团支部的成立

1926年1月，陈国柱由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回莆田，在哲理中学任教。他教的是国文和社会学课程。2月底，他便吸收陈天章、陈兆芳、我、吴承斌、陈德来等同学参加团组织，成立了哲理党团支部，书记陈国柱，组织陈天章，宣传陈德来。我们以“学术研究会”、“读书会”等名义，向各班级同学介绍进步书籍，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新社会观》等，并吸收他们参加阅读、讨论，大家对此都感兴趣。因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家爱国热情高涨，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侵略，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对国内反动官僚、政客为了升官发财，与地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巧立数十种税捐盘剥广大人民；以及军阀为扩张地盘，发展实力，筹枪派饷，而置群众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现实十分不满。大家决心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因此，通过阅读、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唯有进行革命，驱逐帝国主义者，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政权，才能拯救祖国于苦难之中，广大人民方可安居乐业。

这年3月间，我们听陈国柱的话，利用每星期的假日回到各

自家乡，对农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好处，并在澳柄、夹漈两村开展农协活动，还物色了发展党员的对象。也就在这月间，陈国柱离莆赴广东，党团支部由陈天章、陈德来、陈兆芳、我和吴承斌等共同负责。我们先后吸收了徐贻泽、林凤池、翁祖武、王纪修、戴友梅、刘天瑞等参加组织。在这期间，我们还注意从其他县籍的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如永春的林怀才、余丽水，德化的吴郅治、赖锡柱，仙游的邱光兆、林锦如等。我们还控制了哲理中学学生会，掌握了兴化学联会。

二、斗争美籍校长

1926年3月间，教会开展纪念“复活节”活动，在美会教堂的台上排了很多花盆、花缸，且组织儿童唱歌、做游戏等。哲理中学美籍校长章文新把五色旗倒置，用以包裹装饰花盆、花缸。这事被陈天章首先发觉。他便召开支部会作了研究，随即发动全体学生开会，揭露章文新充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有意蔑视中国，竟将国旗倒置的行径，并领导全体学生与章文新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使章文新无言可答。最终迫使章文新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向中国国旗行三鞠躬礼，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仅使广大学生提高了政治觉悟，而且使党团组织的威信也得到明显的提高。

陈国柱于这年8月间又回到莆田，仍在哲理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他秘密地成立了“民校”（即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吸收很多学生、教员参加；我们所有的党团员均参加了“民校”。陈国柱还在莆田其他中学兼教，发展基层革命力量。

三、为纪念“五·卅”惨案周年而发动示威游行

莆田在北洋军阀董胜标旅长的统治下，禁止群众集会游行。为了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我们党支部乃联系发动各学校学

生计约2000人，于纪念日进行示威游行。队伍曾冲过“警戒线”，在旅部门口大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抵制英日货”等口号。反动军阀无可奈何，在旅部门口站岗的哨兵还脸带微笑看着我们。在这期间，有少数学生害怕，偷偷离队，但绝大多数继续示威游行，坚持到终点再胜利返回学校。

四、澳柄、夹漈、山门和女中党支部的成立

1926年6月间，陈天章、我、陈兆芳等5人均转为党员。党组织派陈天章和我同到广业开展活动。我们在澳柄吸收陈蒲川、陈游、陈燕、王样、陈顺德等参加中共组织，成立了澳柄党支部，由陈蒲川任书记、陈游任组织、陈燕任宣传。我们还在夹漈吸收吴国林、李天赐、吴云龙、吴老叔等参加中共组织，成立夹漈党支部，由吴国林任书记、李天赐任组织、吴云龙任宣传，并帮助发展农民协会。与此同时，由林凤池在常太区山门村吸收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当年秋，由陈天章和我共同努力，在咸益女中吸收了郭晓云、吴凤莺、陈玉垂等人入党，成立了咸益女中党支部；并在校内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五、北伐军入莆后的莆田形势

北伐军进入莆田时，由陈国柱组织的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在城里“鼓楼顶”高高挂起，筹备处的负责人曾天毅、陈震、郑炳炎、陈海川、郑秀焜等均在此办公。由于“民校”很快发展到各区，因此涵江、江口、广业、常太等区都很快地吸收了一批国民党员，成立了许多区党部。涵江的负责人为陈德明、黄涵生等；江口为马玉成、李树涛等；广业是我、王慎言等；常太为林凤池等。

为了庆祝北伐军胜利入莆，陈国柱发动各区已组织的农民10万余人入城，在体育场开军民联欢大会，并示威游行庆祝胜利，